

刊名创意:王蒙 刊名题写:沈鹏

本刊主编:姜锦铭

值班责编:李牧鸣 刘小草

邮箱:worthreading01@163.com 电话:(010)88051377

本报记者孙亮全

“问天问地问爹娘，活了这一辈，老天呀，我是甚模样？”

走过了村又一庄，拉起这胡琴来，老天呀，俺们整日里走四方。

云为盖的山为床，暑去寒来，老天呀，俺们走遍了太行。”

正如这首《问天问地问爹娘》歌曲中所唱，在层峦叠嶂的太行山上，有一支盲人队伍，他们背着行李，串成长串，抬头向天。队伍中的人一手抓着导盲棍，一手搭着前面人的背包或肩膀，脚尖颤巍巍试探之后，身体的重量才落下来。深一脚浅一脚，队伍蹒跚在山沟、小路上。行走，演唱，行走，演唱。一个村子，一个村子……寒来暑往，一年要走360多个村庄。

他们行走的时间不以年计，而几乎以世纪算。从“三皇崇拜”到张起“太行抗日救国盲人宣传队”大旗，他们一直背着行囊，为太行乡民歌唱至今。

80多年来，山西左权县盲人宣传队成了“太行山里的文艺重步兵”，他们用流传千年的左权“开花调”唱着自己和山里人的故事。音乐学家田青称他们是“活着的阿炳”，作家唐师曾说他们的音乐“应该跪着听”。

《谁说桃花红，谁说杏花白》

“谁说桃花红来谁说杏花白，瞎瞎地活了这辈啊，我可没看出来。”

山路路你就开花，漫天天你就长，太阳开花是甚模样，这辈子难思量。”

两张桌子一拼，八个凳子一摆，八个盲人摆弄起他们背来的乐器，“咣当”的锣鼓声一响，村民们迅速围拢过来，抽着烟的，抱着娃的，“盲宣队来了，盲宣队来了。”

这是8月12日下午6时，山西省左权县五里堠村街口发生的一幕。锣鼓声毕，左权县“向天而歌”盲人宣传队的成员有的更换了乐器，他们每个人跟前几乎都有两三种乐器，拿在手里，绑在腿上，或放在手边。

演出开始后，反映抗击疫情的新曲目、传统曲目等一首首歌曲，以村民们熟悉的“开花调”旋律，在盲宣队队长刘红权、王树伟等人的口中涌出。

演唱时，除了王玉文把脸埋在双手捧着的笙上，盲宣队大部分队员的脸都朝着天，头部跟着旋律晃动，一下一下，强有力量。他们似乎不管有没有观众，只唱给自己听，只在一曲终了，听到村民们的鼓掌和叫好声时才会回过神，咧开嘴笑。

刘红权唱完《谁说桃花红，谁说杏花白》后，气氛似乎达到了一个高潮，村里63岁的申淑萍自告奋勇，走到刘红权和王树伟身后，简单交流几句，音乐声又起了，在盲宣队的伴奏下，申淑萍唱了一首《二婶婶》。

接下来，几个农村妇女开始推搡一个穿红裙的女人，远处的男人们也跟着起哄，“上去，来一个。”50岁的王仲芳既想去又害羞，最后一摆手，也站到了申淑萍刚才的位置。王仲芳唱的是《有了心事慢慢来》，这是一首当地传统的情歌，王树伟和她对唱。王仲芳的声音响亮，调子很高，最后一句合唱，王树伟破了声，大家哈哈大笑。

演出持续了近两个小时，刘红权连说了几句“完了，散了吧”，这一两百名五里堠村民才陆续散开。

晚上，同事徐伟请盲宣队员们吃饭，中间的几个小插曲让记者意识到这群“没眼人”嘻嘻哈哈、互相打趣，看似豁达背后的艰辛。

吃饭时选了一张大桌子，他们互相拉扯着一个挨一个坐到了座位上。点菜时，刘红权说“一个人点一个”，结果8个人就点出来两个菜，一个是山西最常见的“过油肉”，一个是“凉拌莜面”。“给啥吃啥，谁能叫得出菜的名字呢。”68岁的药成江说。

好在晚上一起吃饭的还有五里堠村的会计，不然又闹出后悔的笑话。等上菜的工夫，他来了，看了一眼说，换座位。盲宣队的8个人按隔一人坐一人的方式分开。

“他们挨着，吃不上饭。”那名会计说完，把大家分散安插在他们中间，负责给他们夹菜，随后他又把这八个人面前的小碟子拿走，一个人发给一个大碗，“有什么菜都给他们夹到碗里。”

《红都炮台》

“红都呀炮台修哩牢，四围呀围墙，同胞呀，两丈多高。”

英勇的八路军坚决往前冲，架云梯过围墙，攻在炮台根。

六月二十三天明四点半，红都呀炮台完了蛋。”

这首《红都炮台》是盲宣队唱了近80年的歌，“红都炮台”是日本人修建在太行山上的一个著名炮台，这首歌就是八路军摧毁炮台后当地百姓表达喜悦而唱出来的心声。

1937年全面抗战以后，八路军北上

太行 『』 阿炳



~中国人的喜酒~

今世缘

特约刊登

~今世有缘 相伴永远~



▲ 2008年8月，盲艺人在表演。

大山摄

80多年来，左权县盲人宣传队成了“太行山里的文艺重步兵”，他们用流传千年的左权“开花调”唱着自己和山里人的故事。音乐学家田青称他们是“活着的阿炳”，作家唐师曾说他们的音乐“应该跪着听”。

抗日开辟根据地。三个师分别控制吕梁、五台、太行诸山脉，作为开展华北游击战争、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、坚持长期斗争的战略基地。

太行山中部的左权县原名辽县，东汉始置辽山县，宋置辽州。“太行八陉，山西锁钥”，意思是八百里太行山，只有八个出山的交通要道，成为打开山西的钥匙。左权县境内的辽河（今浊漳河）与太行山呈“十字”状，成为古“太行八陉”之一。

八路军一二九师挺进太行山中南部之后，开辟了晋冀鲁豫抗日革命根据地。1940年开始，八路军总部、一二九师师部，中共中央北方局、野战政治部、后勤部、《新华日报》社等150多个党政军机构，在左权麻田驻扎了长达五年之久。八路军总部曾在陕西、山西、河北的80多个村庄驻扎过，在麻田时间最长。

左权县史志研究室主任张俊平说，左权县当时有两个政权，一个是在北部今县城所在地的伪政权，一个是在南部麻田的八路军政权，两者相距50公里。麻田除被称为“小延安”之外，还被称为“小江南”，这里是太行山中的一个小盆地，气温较高，且是富水区，左权县有大大小小2000多条河流，独特的自然条件和群众基础决定，适宜总部机关驻扎。

在左权的300多个村庄和各个单位游走演出，是盲宣队的谋生手段。刘红权说，每年正月二十六，队员们在县城集中起来，文化局编排节目集中培训半个月，随后分成两个队，开始下乡，一支队伍负责县城南半部，一支负责北半部。一年走三回，一回两三个月。

“正月里走了，到三四月回来，把冬棉袄换成薄衣服，再下去，八九月回来，穿上冬衣，再下去。转上一圈，就是一年。”刘红权说，去的时候隔一个村子演唱一次，回来的时候把剩下的补上。到了村里演出完吃“派饭”，一家负责一个盲人，所以每个人吃的饭都不一样。村里人家住的地方多就安排在人家里住，没有住处就把教室里的桌子拼起来，当床，“桌子、椅子、凳子都睡过。”

王玉文说，盲宣队下乡就靠着两条腿走，有点视力的在前面领着，其他人搭着前面人的背包。每个人身上都背着几十斤重的包，里面有铺盖、衣服、鞋子、毛巾等日常用品，还有与他们相依为命的乐器。他们不带碗筷，但是带尿壶，晚上起夜不方便。

“有时候一天走20多里，刚开始走时腿疼、肩也疼，后来就习惯了。”1995年加入盲宣队的刘红权一走走了20年。太行山崎岖不平，有的地方甚至没有路，盲人行走难度可想而知。没有路，没有桥，盲宣队最害怕的是下雨下雪，陈玉文如今还对刚进队时的一次过河心有余悸。刚下完雨的太行山里河水暴涨，“衣服都脱干净，两个村民架着一个个盲人

《伪军十大恓惶》等，在根据地演出的书目有《红都炮台》《人民子弟兵》《拥护八路军》《左权将军》等。

但是盲宣队并没有进入革命队伍的正式序列，抗战胜利后他们依旧是流浪的民间艺人，是文化部门领导的一支编外队伍，宣传党和国家的政策。“太行抗日救国盲人宣传队”改名为“左权县盲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”，他们又演唱《歌唱互助组》《合作社》《反腐败》《打假冒商品》《左权十大变》《退耕还林》《抗击疫情》等。

《光棍苦》

“正月里梅花开，花开人人爱，光棍有心采一枝，拿回家没人爱。”

二月里刮春风，光棍没人好伤心，衣服上破的都是窟窿窿，还得光棍去求人给缝，光棍有心不去求人缝，春风吹得腰腿痛。”

……

十二月一年了，大小人说过年好，案板上家家响得叮叮当当，家家剩肉都吃过饺子，有老婆的人家吃饭饺，光棍吃的面条。

这首传统的琴书《光棍苦》是盲艺人唱自己。盲宣队没有来自国家财政的生活保障，他们靠农村市场养活自己，一旦离开队伍，就无法生存。

今年68岁的王玉文是目前盲宣队最早加入的队员，王玉文出生在左权县边上一个叫独兰凹的村庄，14岁瞎了眼，18岁放羊就瞧不见羊了。1975年，王玉文跟上了盲宣队。

在左权的300多个村庄和各个单位游走演出，是盲宣队的谋生手段。刘红权说，每年正月二十六，队员们在县城集中起来，文化局编排节目集中培训半个月，随后分成两个队，开始下乡，一支队伍负责县城南半部，一支负责北半部。一年走三回，一回两三个月。

“正月里走了，到三四月回来，把冬棉袄换成薄衣服，再下去，八九月回来，穿上冬衣，再下去。转上一圈，就是一年。”刘红权说，去的时候隔一个村子演唱一次，回来的时候把剩下的补上。到了村里演出完吃“派饭”，一家负责一个盲人，所以每个人吃的饭都不一样。村里人家住的地方多就安排在人家里住，没有住处就把教室里的桌子拼起来，当床，“桌子、椅子、凳子都睡过。”

王玉文说，盲宣队下乡就靠着两条腿走，有点视力的在前面领着，其他人搭着前面人的背包。每个人身上都背着几十斤重的包，里面有铺盖、衣服、鞋子、毛巾等日常用品，还有与他们相依为命的乐器。他们不带碗筷，但是带尿壶，晚上起夜不方便。

“有时候一天走20多里，刚开始走时腿疼、肩也疼，后来就习惯了。”1995年加入盲宣队的刘红权一走走了20年。太行山崎岖不平，有的地方甚至没有路，盲人行走难度可想而知。没有路，没有桥，盲宣队最害怕的是下雨下雪，陈玉文如今还对刚进队时的一次过河心有余悸。刚下完雨的太行山里河水暴涨，“衣服都脱干净，两个村民架着一个个盲人

蹚水，水到了胸口，脚下够不着底。”陈玉文吓个半死，怕被冲走。

从1938年至今，盲宣队多的时候有40多名成员，现在还有八个人。这中间，五个人还能看见点光，三个人彻底失去光感，陷入无边黑暗。

八个人中，一共有三个人结过婚，目前只有两个人有妻子。

50岁的刘双明曾结过婚，30岁那年害了场眼病，视神经萎缩了，此后再没看见过东西，包括太阳。看不到太阳是盲人的底线，就是说对光没有了感觉。两年后，妻子和刘双明离了婚，把几岁的女儿留给了他。上有老下有小的刘双明哭着把女儿丢给老母亲，离开距县城130多里路的车谷村，参加了盲宣队。“上有老，下有小，总得有个收入吧。”刘双明说。

资深记者南香红在2003年采访完刘双明时写道：刘双明的悲苦是刀刻在脸上的，什么时候也丢不掉。他总是默默地坐着，一双完好但没有光泽的眼睛看着前方，好像那眼睛里随时有眼泪流下来。

“不习惯，不习惯。”刚入盲宣队一年的刘双明头上顶着一个大包，是撞出来的，导盲棍在他手里还不灵巧，走哪儿撞哪儿。

每年盲宣队结束放假，在县城集合时，刘双明天不亮就得起床，从村里出发摸索走五里地，坐上公交车，再用大半天时间才能到县城。在县城，他在一个戏台里住了七八年。

这是一个废弃的戏台子。从1990年开始，盲宣队发现了这个无人问津的地方，把后台修了修，改造成一个小院子和几间破房子，一个房间里挤上七八个人，就算是盲宣队在县城落脚的地方。

事实上，参加盲宣队也不容易。刘双明打了两年梆子，学了二胡，又学笙，在2005年以后才有了收入。“盲宣队实行工分制，按演出贡献分配，刚来的这两年，还是学徒，队里可怜我，才额外给点钱。”刘双明说。

队长刘红权直到父亲去世，才得以加入盲宣队。患有先天性小眼球和小角膜症状的刘红权是遗传，他的母亲是个盲人，17岁时嫁个40岁还没讨上老婆的工人。生下的四个儿子中有三个睁开了眼。

与盲宣队其他成员来说，在太行山盲人宣传的唢呐声里长大的刘红权是幸运的。家里供他在太原读完了盲校，并学了健康按摩。毕业后在一家浴池工作的刘红权感到压抑，在浴池里拉二胡，老板说“这不对”。但是刘红权的父亲坚决不同意他参加盲宣队，认为那样太苦，哪怕刘红权托盲宣队老队员到家里求过几次情也不管用。直到1995年父亲去世，刘红权终于返回了大山。“大山里自由，唱起来快乐。”刘红权说。

王玉文说，盲宣队下乡就靠着两条腿走，有点视力的在前面领着，其他人搭着前面人的背包。每个人身上都背着几十斤重的包，里面有铺盖、衣服、鞋子、毛巾等日常用品，还有与他们相依为命的乐器。他们不带碗筷，但是带尿壶，晚上起夜不方便。

“有时候一天走20多里，刚开始走时腿疼、肩也疼，后来就习惯了。”1995年加入盲宣队的刘红权一走走了20年。太行山崎岖不平，有的地方甚至没有路，盲人行走难度可想而知。没有路，没有桥，盲宣队最害怕的是下雨下雪，陈玉文如今还对刚进队时的一次过河心有余悸。刚下完雨的太行山里河水暴涨，“衣服都脱干净，两个村民架着一个个盲人

《上辈子,下辈子》

“梁柱子那个花开，撑起一间间房，下辈子好歹睁开眼，把这恩报偿。

太行山那个开花，走也走不到头，下辈子好歹睁开眼，看看这圪梁和沟。”

太行山盲人唱的这首《上辈子,下辈子》，叫作左权县盲艺人琴书调，又叫

“如今山西民歌最有名的是左权民歌和河曲民歌，河曲民歌讲究创新，左权民歌则坚持传统。”刘洪庆说，继左权民歌红色歌舞剧《太行奶娘》之后，当地正根据盲宣队的故事，紧锣密鼓拍摄新的剧目《向天而歌》。

“幸福的花儿心中开放，爱情的歌儿随风飘荡，我们的心儿飞向远方。憧憬那美好的革命理想，亲爱的人携手前进，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。”

这首为央视某节目演出而改编的“开花调”版《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》，如今也是盲宣队表演的高频曲目。首次演出时，坐在台下的原唱、歌唱家于淑珍当场流泪。

“从《谁说桃花红，谁说杏花白》唱到《桃花不再红，杏花不再白》，现在还是《桃花红，杏花白》。”刘红权说，他们这批盲哥们儿，借福、知足。

1952年出生、20岁上被雷管将左手和右眼炸没的王玉忠，30多岁时娶了带着一儿一女的女人。现在，大女儿出嫁了，儿子读完大学成了家，亲生的小女儿正在读研究生。

1953年出生、20岁上被雷管将左手和右眼炸没的王玉忠，30多岁时娶了带着一儿一女的女人。现在，大女儿出嫁了，儿子读完大学成了家，亲生的小女儿正在读研究生。

“从《谁说桃花红，谁说杏花白》唱到《桃花不再红，杏花不再白》，现在还是《桃花红，杏花白》。”刘红权说，他们这批盲哥们儿，借福、知足。

“从《谁说桃花红，谁说杏花白》唱到《桃花不再红，杏花不再白》，现在还是《桃花红，杏花白》。”刘红权说，他们这批盲哥们儿，借福、知足。